

中共核武發展與其對外關係之演變 —冷戰時期（五〇至八〇年代）

陳世民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中共之核武發展對其對外關係的影響，在美、蘇各國及中共本身均有意予以淡化的情況下，一直是被忽略的因素。中共在七〇年代末以前，由於核武的易毀，故一直存有預先手術清除其核武之攻擊的威脅。這在六〇年代末以前，唯一有能力的美、蘇可能均有此興趣，而存有共同利益，亦導致中共對美、蘇勾結對付中共的疑慮。到了七〇年代初，隨著中共核武對美、蘇之威脅程度的差距日大，及戰略均勢時代的來臨，美國開始重視中共的獨立戰略價值，中共亦需要美國可能的間接保護，這多少影響七〇年代初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開展、戰略三角的形成及中共在其中角色的扮演。八〇年代初以後，中共核武報復能力的逐漸獲得，使之不須再過於依賴美國的間接保護；而得以威脅美國本土之核武實力的開始獲致，亦給予蘇聯利用中共制衡美國的機會。這亦有助促進中共和蘇聯關係正常化的開展，及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ABM條約的廢除，則令北京擔憂美國是否將因而再度獲致對中共發動第一擊的能力。

關鍵詞：中共核武、中共外交、中美關係、中蘇關係、戰略三角

* * *

一、前言

「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弹、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①

——鄧小平

註①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1927-199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五二六。

中共自五〇年代中期開始發展核武以來，其冷戰時期的對外關係經歷了一段戲劇化的演變，從五〇年代對蘇聯的一面倒，至六〇年代下半葉的同時反美反蘇，到七〇年代轉而聯美反蘇，而後至一九八二年又改而強調「獨立自主」外交。對於這一系列的轉變，在過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加以分析探討，然而大多數研究對上述中共對外關係之重大轉變的分析，均甚少言及中共「核武實力進展」此一因素的影響，亦未見何論著曾對此因素在此時期的影響做一完整及全面的探討。本文即是基於認為此一具有重大戰略意涵的核武實力進展，對中共對外關係的演變實有其不容忽視的影響，因而嘗試對此做一全面分析。

不同於英、法二國，在中共核武發展過程中，並未擁有軍事超強明確核保護傘的安全承諾。從一開始核武發展的易毀、弱小，直到逐漸獲致可信的第二擊報復能力，可能得以令他國遭受難以忍受之摧毀，在此過程中可就其核武能力之進展與威脅範圍分為幾個階段。在每一階段中，中共之戰略、外交環境可能將因其核武實力之進展而有所變化，進而影響到中共之對外政策，及他國和中共的互動關係。

此外，冷戰結束後核武擴散日益成為國際安全局勢上備受關切的議題，尤其是北韓核武危機之再起，令人擔憂是否將導致核武擴散骨牌效應，並動搖三十多年來對國際安全穩定的維持有重要影響的「核不擴散條約機制」^②。倘若日後核武擴散骨牌效應難以阻擋，則這些擴散國的核武發展，會對其對外關係造成如何之衝擊呢？而此一衝擊是否會隨著其核武實力發展的不同階段所隱含的不同戰略意涵，而影響該國對外關係的演變？這實為對日後可能出現的核武擴散世界之局勢觀察上所不容忽視的問題。由於日後可能出現的新擴散國，其核武發展過程可能都難以獲致如英、法二國般的明確核保護傘的安全承諾，因此中共過去的核武發展歷程，及其對外在戰略關係所造成的影響，或許可提供一較具參考價值的經驗，以助我們思考未來新興核武國的可能政策走向。

因此本文亦希望以中共的經驗，來探討一國核武實力的進展，所可能對其外在戰略環境與對外關係之演變產生的影響^③。由於中共自建立政權以來，其對外關係可說

註② 誠如美國中情局長泰內特（George J. Tenet）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一日在國會所言：「在過去一年中，有關核武擴散的問題所出現的轉變，比其他任何問題都大。」當美國正陷於伊拉克問題之際，北韓明顯利用美國可能無暇東顧，於一月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而後二月初伊朗亦顯然趁此時機對外宣布其已擁有獨自提鍊鈾的能力。這使泰內特認為：「我們已進入一個新的武器擴散世界，廿一世紀的骨牌理論很可能是核武骨牌理論。」George J. Tenet, "The Worldwide Threat 2003: Evolving Dangers in a Complex World," *Testimony of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befor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February 11, 2003) (http://www.odci.gov/cia/public_affairs/speeches/2003/dci_speech_02112003.html; accessed 20030812).

註③ 然而須先指出的，任何有關核武影響的探討，可說是像卡恩（Herman Kahn）所言，是在「思考不可想像的事」（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這乃是以「最壞情境分析」（Worst-case Analysis）為探討之基礎，且難有實證依據。不過這是有關核武影響之研究所必然面對的問題，畢竟核武此一可導致世界末日的武器，是不可能拿來試驗的。此外在美、蘇等國均刻意壓低核武所予中共的影響力，以免刺激核武擴散及影響其核武強權的既得地位；而中共本身亦有意忽視其核武之角色，以免導致其鄰國的不安，甚至跟著發展核武，尤其是對日、印而言。因而有關中共核武角色之研究，難以見到公開的官方文件做為論證依據。然而基於核武這種巨大毀滅的武器所將予本國及他國戰略環境的巨大潛在影響，即使有上述資料之困境，仍有加以探討之學術價值。上述引句乃卡恩一本有關核武戰略之名著的書名。Herman Kahn, *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62).

是以對美和對蘇（俄）關係為主軸，且美、蘇又是中共核武之最大假想敵，亦是世上僅有的兩個有能力及意圖手術清除中共核武的國家。因此底下乃以中共和美、蘇（俄）之關係為探討之重心，分析中共核武發展對此互動關係的影響。茲就中共核武能力與威脅範圍之演進，分為三個階段加以探討。

二、核武易毀、弱小，對美、蘇之威脅同樣均小的時期—五〇年代中葉開始發展核武至六〇年代末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共做出發展核武之秘密決定，然而在五〇年代末期已廣為世人所知。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共首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但這乃是以在鐵塔上內爆的方式試爆，尚未結合載具，故嚴格說起來仍不具核武攻擊能力。一九六五年五月首次結合飛機以空投方式試爆成功，但其航程及突破能力仍差，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結合其東風二號導彈成功，方象徵著中共真正具備了核武攻擊能力^④。東風二號之射程不到二千公里，只能威脅美國一些東亞基地，及蘇聯西伯利亞一些不太重要的地區。一九六七年五月東風三號試射成功，射程可及於菲律賓及幾乎整個亞俄地帶，對蘇聯本土之威脅範圍加大，一九七〇年已擁有五枚，但直到一九七一年方開始部署。至於其彈頭和載具數在六〇年代末均尚未超過五十，因此其核武仍十分弱小、易毀，而且對美、蘇之威脅仍同樣地均甚小^⑤。（見表一、二）

因此六〇年代末期以前，可說是最易誘使美、蘇超強均有意對中共做「外科手術式清除其核武的預先攻擊」之階段。面對核武巨大、快速毀滅且難以防禦之特性下，此種攻擊實為唯一有效且能永絕後患的方式^⑥。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對中共核武做手術攻擊之極有利情況的時間有限，美、蘇唯有在中共尚未發展出可殘存的核武報復能力以前便採取行動，摧毀其所有核武設施，否則一旦中共核武在敵人第一擊下，仍能殘存足以構成對方難以忍受之損害的報復能力，「預先手術攻擊」的時機便告消失，他國便不得不接受中共的核武強權地位，並承認中共核武所可能對之造成巨大損害的

註④ 有關五、六〇年代中共研發核武之過程，在當時主持中共國防科研，而有「兩彈一星之父」尊稱的聶榮臻，在其回憶錄中有極為一手的記載。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亦參見：John W. Lewis and Litai Xue, *China Build the Bomb*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註⑤ 本文之研究目的主要乃在探討中共核武實力進展對其對外關係的影響，至於中共核武實力之探究則非本文重點，在中共仍對其核武實力高度保密之情況下，本文對中共核武實力及其進展的描述，主要乃依據西方的評估。請參見表一、二。

註⑥ 除了此種直接攻擊方式外，其他可能的三種方式，例如使核武無法攻擊到本土，將其攔截於飛行途中的直接防禦方式（如 ABM 系統）；或者降低核武毀滅效果的間接防禦方式（如民防）；還是發展可使敵方遭受難以忍受之摧毀的第二擊報復能力，來嚇阻對方不敢發動核戰的間接攻擊方式（如相互保證摧毀），此三種方式至今均無法完全根除核武的威脅。「外科手術式清除核武的預先攻擊」最明顯的例子，即一九八一年以色列對伊拉克核設施的攻擊，及波灣戰爭後美國對伊拉克核武設施的摧毀。

潛在威脅之既定事實。在此一時間有限的急迫感下，更增加在此短暫時間裡，美、蘇做此攻擊以清除中共核武的興趣與誘惑。

表一 中共核武實力

載具型號	東風-2	東風-3A	東風-4	東風-5A	東風-21A	東風-31	巨浪-1	轟-6	強-5
西方命名	CSS-1	CSS-2	CSS-3	CSS-4	CSS-5	CSS-X-9	CSS-N-3	B-6	A-5
種類	MRBM	IRBM	ICBM	ICBM	IRBM	ICBM	SLBM	轟炸機	
試射(飛)日期	1964,6,29 A	1967,5,26A	1971,9,10A	1980,5,18A	1985,5,20C	1995,5B	1982,10,7 A		
部署日期	1969,9A	1971,3A	1980CD 1978/9E	1981CE	1985-86D	2005 ?H	1983/4E 1986D	1965D	1970D
射(航)程(公里)	1000F- 1100G	2500F- 2800D	4750D- 7000E	13000D	1800D	8000	1700CD- 3000E	3100D	400D
2003年彈頭數 D	0	40	12	20	48	?	12	120	30
能載彈頭數 x 彈頭火力 (tone)	1xD 20kt	1xD 3.3mt	1xD 3.3mt	1xD 4-5mt	1xD 200-300kt	1or MIRV x 700kt H	1xD 200-300kt	1-3x 炸彈 D	1x 炸彈 D
飛彈節數	1C	1C	2C	2C	2C	3B	2C		
燃料 C	液態	液態	液態	液態	固態	固態	固態		
直徑(公尺) C	1.6	2.25	2.25	3.35	1.4	?	1.4		
高度(m) C	20.6	24	28	32.6	10.7	?	10.7		
發射處	機動 G	機動 B	地窖 B	發射井 B	機動 B	機動 B	潛水艇		
發射所需時間 G	數小時	數分鐘	數分鐘	數分鐘			數分鐘		
可威脅處	日本	亞俄、 菲律賓 關島	歐俄 關島	美國本土	日本 琉球	歐俄			
備註	1979 年除役					1 夏級潛艇 B			

另有戰術核武(大砲、地雷及短程飛彈)，120 個彈頭 D

MRBM: Medium-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RBM: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CBM: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SLBM: 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資料來源：A: 閻少軍，「我國進行核試驗、發射戰略導彈運載火箭地球衛星簡況」，軍事史林（北京），總第二十六期，一九九〇年七月第二期，頁五〇～五一。

B: Robert S. Norris and William M. Arkin,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uclear Notebook: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01,"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57, no. 5, (Sep./Oct. 2001), p. 72.

C: John Wilson Lewis and Di Hua, "China'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Technologies, Strategies, Goal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2 (Fall 1992), pp. 9~11.

D: Hans M. Kristensen, "Chinese Nuclear Forces, January 2003," *SIPRI Yearbook 20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http://projects.sipri.se/nuclear/china.pdf>; accessed 20030812).

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3-1994* (London: IISS, 1994), p. 244.

F: 姜直操編譯，「中國核力量概況」，軍事史林（北京），總第三十五期，一九九一年七月第四期，頁一六～一八。

G: Robert E. Johnson, "China's Nuclear Forces and Policies," in Larry M. Wortzel, ed.,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8), p. 70.

H: Harold Brown, Joseph W. Prueher and Adam Segal, *Chinese Military Power*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3), p. 49.

表二 中共核武實力的演進（1964-1989年）

	圖-4	轟-6	強-5	東風-2	東風-3	東風-4	東風-5	巨浪-1	載具數	彈頭數
年份	轟炸機			MRBM	IRBM	ICBM		SLBM		
1964		1							1	0
1965		2							2	2
1966	13	2		5					20	10
1967	13	2		10					25	20
1968	13	5		15					33	30
1969	13	15		20					48	45
1970	13	25		30	5				73	75
1971	10	35		40	10	2			97	102
1972	10	45		40	15	3			113	118
1973	10	55		40	20	5			130	125
1974	10	60	5	45	25	5			150	140
1975	10	65	10	45	30	5			165	155
1976	10	70	15	45	30	6			176	170
1977	10	75	20	45	30	6			186	176
1978	10	80	25	50	40	6			211	201
1979	10	90	30	50	50	6	2		238	230
1980	5	100	30	50	60	8	2		255	250
1981	0	100	30	50	70	8	4		262	262
1982	0	105	30	45	75	8	4		267	272
1983	0	110	30	45	80	10	4		279	284
1984	0	110	30	40	90	10	6		286	296
1985	0	110	30	40	90	10	6	12	298	308
1986	0	115	30	35	85	10	8	12	295	300
1987	0	115	25	30	80	10	8	12	280	290
1988	0	120	20	25	75	10	8	24	282	292
1989	0	120	20	20	70	10	10	24	274	284

資料來源：姜直操編譯，「中國核力量概況」，軍事史林（北京），總第三十五期，一九九一年七月第四期，頁二〇。

此外，在六〇年代末期以前，中共核武對美、蘇之威脅程度大致相同，且均甚小的情況下，兩超強基於核武壟斷所帶來的巨大既得政治利益，將使兩強具有防止其他核強權出現的「共同利益」。即使因美、蘇兩強之敵意與不信任感，而難以合作去做預先手術攻擊，但仍可能默許另一超強個別去完成此工作，此一「默許」本身即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這多少影響到中共於六〇年代後半期對於美、蘇兩超強均有高度之不信任感，並對美、蘇之間任何談判及和解跡象，存有高度之敏感，擔心這是美、蘇可能「勾結」以對付中共^⑦。

(一) 就美國而言

五、六〇年代美國與中共之間存在高度敵意，因此中共準備發展核武，在一開始美國的反應最為激烈。尤其是當時越戰正逐漸昇高，一九六四年美國通過金蘭灣決議案，並和日本達成協議允許美國核潛艇進入日本基地，一九六五年開始派兵越南，美國多少擔心中共是否會像韓戰那樣介入越戰。因此中共發展核武初期，雙方正處於高度對立狀態，美國對中共發展核武實覺芒刺在背，而欲予以根除。由日後美國解密之資料中，可看出美國方面有人可能會有過此一想法。

一九六三年有限核武禁試條約的順利簽定，除了古巴危機之影響外，亦多少受到中共即將試爆核武成功之刺激。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在國安會上曾言：「中共有了核武之後，世界會變得什麼樣子，簡直不可想像。中共是個重大的危險，如果禁試條約真能阻止中共變成一核武強國，禁試是有利的，我受不了中共變成一個核子國家。」^⑧這多少可看出美國對中共即將發展核武成功一事感到憂慮。一九六三年七月甘迺迪給禁試會議代表的指令中曾提到：「大量核武儲存是美、蘇唯一的特點，但是少量核武在像中共那般人手中，對我們大家可能極為危險，……你應極力找出赫魯雪夫對限制或阻止中共核武發展的方法之看法，及其願意由蘇聯為這目標行動，還是願意接受美國的行動。」^⑨更為明確的是其國防部在此會議之前所準備的「絕對機密」簡報，其中有一單元詳細討論莫斯科對美國所建議的「和蘇聯合作採取激烈步驟以阻止核武進一步擴散」之可能反應。簡報作者曾註明：如果蘇聯採納美國的建議，這可能需要「蘇聯或可能美、蘇聯合使用武力」對付中共^⑩。打算採用什麼武力，在目前已解密的文件中未曾言明，但是一項可能的選擇當是空襲位於中國西部內陸的核武設施。根據當

註⑦ 如一九六八年簽定的核武不擴散條約，一九六九年開始進行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中共對之均有高度敏感之反應，懷疑這是美、蘇聯合要對付中共的可能跡象。一九六八年六月當核武不擴散條約正在聯合國開會討論時，美、蘇亦達成共識，準備將進行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中共當時曾抨擊此一在美、蘇主導下的會議，乃是為了「在核裁武的假面具下組成一反中國的核武聯盟」，乃是「美、蘇之間的暗中串通與勾結」。“U.S.-Soviet Collusion: Dirty Deal on Deal,” *Beijing Review* (July 5, 1968), p. 33.

註⑧ Gordon H. Chang, “JFK, China, and the Bomb,”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4, no. 4 (March 1988), p. 1294. 在本文中，Chang 利用不少已解密的美國檔案資料，對此問題做一分析。

註⑨ *Ibid.*, p. 1300. 此一「行動」顯然是政治以外的方法，因為雙方當時無正式外交或貿易關係，而中共經濟又是自給自足，除了軍力外，美國能影響中共的手段甚少。

註⑩ *Ibid.*, pp. 1301~1302.

時一位高層官員所言，當時的確曾討論過一項美、蘇聯合的核武突襲，一個想法是美、蘇各派一架轟炸機至羅布泊核基地上空，各投一枚炸彈，不過赫魯雪夫顯然未準備採取和美國配合的行動^⑪。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共試爆成功前一個月，美國總統詹森曾批准兩項決定：「一、此刻我們不贊成無緣無故地由美國單方面對中共核武設施採取軍事行動，我們現今寧可見到中共試爆成功，亦不願採取上述行動。但是如果為了其他原因，使我們發現自己和中共處於任何層次的軍事敵對狀態，我們當仔細考慮以適當的軍事行動攻擊中共核武設施的可能性。二、我們認為如果政府有興趣，有許多和蘇聯聯合行動的可能。這些可能包括警告中共不准試爆、或者擔保放棄地下試爆的可能；以及若中共堅持要以任何方式試爆，則要其自行承擔後果；再不然，甚至去和蘇聯達成一可能的協議來合作從事預防性的軍事行動。所以我們贊同最好是由國務卿儘快和駐蘇大使十分隱密地探究這個問題。」^⑫中共試爆成功後，亦可見到美國一些較保守的媒體，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共核武施以手術攻擊^⑬。從上述資料多少可看出美國對中共的核武發展有其憂慮之處，且可能亦考慮過是否要對中共弱小核武施以手術攻擊，這難免升高六〇年代中、後期美國和中共之間的不信任感及敵意，尤其在當時越戰日益升高的敏感時刻。

（二）就蘇聯而言

基於中、蘇之地緣關係，中共一旦發展核武成功，將成為蘇聯唯一的核武鄰國，這亦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相鄰的核武國，就長期而言，這對蘇聯的潛在威脅遠高於對美國。中、蘇雖同是共黨國家，但意識型態因素顯然敵不過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考量，一九六〇年蘇聯撤回其所有技術專家，便已顯現出她沒有意願協助中共擁有自己控制的核武^⑭。一九六三年蘇聯同意簽署有限核禁試條約，更明白的表達出此一意向，而此約亦進一步加深了中、蘇共分裂的程度^⑮。但當時蘇聯對美國所可能暗示的：是

註^⑪ *Ibid.*, p. 1304.

註^⑫ *Ibid.*

註^⑬ 一九六五年一月和六月美國的保守派雜誌 *National Review* 曾相繼主張：美國應摧毀中共現有的一切核武能力，以保證在若干年內中共不能發展核武。*Ibid.*, p. 1287.

註^⑭ 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中共予蘇聯政府的備忘錄中曾言：蘇聯那一套是要「保持自己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核武）壟斷地位，……只許你們一家幹，不許別的兄弟國家同你們一道幹，……要大家服從你一人，你一人控制大家，……中國人民決不承認某一個或者某幾個大國壟斷世界核力量，對別的國家任意發號施令的特權。」。韓先龍等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一二一。

註^⑮ 當年七月在莫斯科同時有二個會議，一為商談改善中、蘇共兩黨關係的會議，一為美、蘇、英的禁試條約會議。而當時中共或許還未真正想和蘇聯分手，例如在會議期間，中共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我們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許美帝國主義插手中、蘇分歧」等文。但七月五日至二十日舉行的中、蘇共會談破裂，而同月二十六日美、英、蘇三國簽署有限核禁試條約，這予中共甚大刺激，懷疑蘇聯在試圖聯合美、英來對付中共。不久之後，中共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連續發表九篇批評蘇共的文章（世稱九評），這多少可能受到以阻止中共發展核武為主要目的之一的有限禁試條約之相當影響。參見：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台北：幼獅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第五版），頁四九。

否默許美國，或甚至和美國聯手清除中共核武設施之事，則仍多所猶豫，尙不願做表示^⑯。

一九六四年十月初中共首次試爆成功，幾乎在同時蘇聯以官方所稱的健康因素罷免赫魯雪夫的黨魁職務。蘇聯國內政爭，加上美國日益升高對越戰的介入而可能無暇東顧，使中共對當時「美、蘇聯手對付中共」的擔憂，或許得以稍緩。但中、蘇共關係仍繼續惡化，一九六五年三月在莫斯科的世界共黨會議，被中共斥之為「分裂會議」，而蘇聯對中共核武之發展則日益敏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訪美的蘇聯外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曾把蘇聯對中共武力威脅的憂慮告訴詹森及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t），此一威脅明顯是指中共正在發展的核武，畢竟其落後的傳統武力實無力威脅蘇聯內陸。十二月六日蘇聯總理柯錫金（A. N. Kosygin）又告訴新聞界，只要越戰可以結束，他樂於發展存在於美、蘇之間的「利害關係共同體」（community of interests）。而美國官員們則繼續秘密地討論是否要和蘇聯合作，攻擊中共的核武設施。十二月十日中共「外長」陳毅曾對此公開回應，譴責蘇聯陰謀「聯合美國控制世界」，並存有美、蘇聯合進攻中共的威脅^⑰。

一九六六年一月蘇聯和蒙古簽定「友好合作互助協定」，從此蘇聯不但可以駐軍蒙古，並得以保有基地，而同一時間蘇聯亦開始將現代化部隊由東歐調至遠東^⑱。一九六八年五月北越同意和談，美、蘇和解之阻礙大減；七月美、蘇主導的核不擴散條約簽字，八月蘇軍入侵捷克，美國未採激烈反應，似乎默認布里茨涅夫當時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論」；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森就職日，蘇聯再次向美國提議SALT 談判，一周後美國同意，雙方開始積極籌備，這些多少都增加中共關於「美、蘇聯合以對付中共」的可能戰略顧慮。

蘇聯對中共核武做預先手術攻擊的可能意圖，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軍事衝突中更明顯地表露出來。據蘇聯一重要外交官的回憶，當時一些蘇聯的高層曾討論是否要對中共施以核武攻擊，「以求一次消除中共的威脅」。蘇聯國防部長格烈奇科（Andrei Grechko）亦曾主張對中共發動一可能會導致高度輻射擴散及數百萬中國人死亡的大規模攻擊^⑲。蘇聯第一副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亦言：「可行的辦法是用數量

註^⑯ Gordon H. Chang, "JFK, China, and the Bomb," p. 1305.

註^⑰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75。一九六七年六月一位蘇聯領袖在美、蘇高峰會上亦曾技巧的問詹森總統：「如果有十億擁有核武的中國人住在加拿大，每天都痛斥美、加邊界是帝國主義非法的產物，閣下有何感覺？」*Ibid.*, p. 279。此乃作者 Chang 一九八五年和當時（一九六七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斯陶（Walt W. Rostow）訪談所得。

註^⑱ 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p. 167.

註^⑲ 此外交官乃當時負責和西方接觸的最主要蘇聯外交官之一的謝爾前科（Arkady N. Shevchenko），1985 年曾出版一回憶錄 *Breaking with Moscow*，描述中、蘇之分裂。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p. 285.

有限的核武器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打擊，以威嚇中國人，並摧毀他們的核設施。」^②而後在八月十三日顯然是蘇聯挑起的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的衝突時，季辛吉曾回憶：八月十八日美國國務院一名中級蘇聯專家，和蘇聯使館一官員共進午餐，此官員曾問道：「如果蘇聯攻擊中國的核武設施，則美國將如何反應？」^③八、九月蘇聯的媒體亦一再放風聲，暗示對中共先制攻擊的可能。八月二十七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亦向記者透露，蘇聯似乎正就她對中共核武設施發動先發制人攻擊的可能性，向其歐洲共黨弟兄試探；而同時美國中情局亦已偵查到蘇聯在遠東地區已部署長程轟炸機，得以隨時轟炸中共的核武基地^④。這多少可看出當時蘇聯曾謹慎考慮過對中共核武做預先手術攻擊的可能性。

（三）就中共而言

中共應當亦十分了解其核武發展初期所易誘致的「預先手術攻擊」的高度威脅。一九八七年張健志在解放軍報上所發表的或許是中共首篇公開探討其核武戰略的文章中曾指出：「無論那個國家，核武器的發展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飽和』點，其標誌是『數量足夠』和『質量可信』。在達到『飽和』點以前，儘管核武器也有威懾作用，但由於實戰能力尚不完備，極易受第一次打擊而被解除核武裝。所以從戰略上看，這段時間是『潛伏危險』期。」^⑤官方色彩濃厚的當代中國外交一書中，亦提到周恩來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和柯錫金會談時曾道：「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⑥這均顯示中共在與蘇聯正式武裝決裂後，應當體認到其易毀核武所易誘致預先手術攻擊的高度威脅。

因此，在六〇年代下半葉，中共所發展的核武由於仍弱小、易毀，反而因為可能誘致美、蘇均有意採取「預先手術攻擊」，而予中共負面的安全意義。更重要的是，由於此時期中共的核武實力對美、蘇的威脅均同樣不大，美、蘇基於核武壟斷而獲的巨大政治既得利益，顯然均不希望未來出現另一個核武強權，以致損其利益及予其巨大潛在威脅。因此美、蘇對於向中共核武做「預先手術攻擊」一點具有「共同利益」，即使因美、蘇之敵意及不信任感而不致合作去做，但仍可能「默許」另一超強個別去完成此一工作。因此此時期乃核武發展上帶給中共最大危險的時期，且亦給予美、蘇合作以對付中共的極佳誘因，使中共對美、蘇均難以信任，這對當時中共同時反美反蘇的對外政策，或許多少有其影響。

註^② 引自胡彥林，「未來戰爭很可能是場有限核戰爭」，國防大學戰略教研室選編，軍事思想論叢（北京：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三七六。

註^③ 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183.

註^④ *Ibid.*, pp. 183~184.

註^⑤ 張健志，「對中等有核國家核戰略之我見」，解放軍報，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日，第三版。

註^⑥ 韓先龍等編，當代中國外交，頁一二五。而一九六九年毛澤東向中國人民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口號，前兩個顯然是針對核武之攻擊而言。

三、核武僅足以對蘇聯本土構成相當威脅，但尚不及於美國本土的時期—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末

六〇年代後半期中共核武的快速成長，可說令外界印象深刻^㉙。然而基於地緣政治的影響，中共核武對蘇聯之威脅日大，但一時尚威脅不到美國本土。一九六七年試射成功的東風三號，已可及於亞俄之大部分，一九七〇年已擁有五枚，一九七一年開始部署。一九六七年六月氳彈試爆成功，大增其彈頭摧毀能力。一九七一年準洲際飛彈東風四號試射成功，射程已可達歐俄，包括莫斯科在內，但只可達阿拉斯加，仍不及美國本土。至於其核武載具與彈頭數量雖然增加不快，但照西方之評估，至七〇年代末期亦均已超過二百，約和英、法兩國之實力相當^㉚。這些核武在一九六九年中蘇衝突後，蘇聯幾已成為中共導彈所瞄準之唯一目標^㉛。至於可能早已研究出來的足以打到美國本土的東風五號，卻到一九八〇年方才試射。因此，七〇年代中共的核武，可說是以蘇聯為對象的高度單面向嚇阻姿態^㉜。在中共核武對美、蘇兩國之威脅程度的差距日益加大下，此一差距的戰略意義實有其不容忽視之處，由此可看出中共之核武實力進展，與其戰略、外交環境的演變有相互影響之關連。

(一) 中共核武實力之進展與七〇年代初「戰略三角」的形成

六〇年代末期以前，中共核武對美、蘇之威脅均小，兩超強對於趁早摧毀中共核武一事，均具有共同利益與可能興趣。然而六〇年代末期以後，中共核武實力之增長對蘇聯的威脅日益加大，但仍無法威脅到美國本土，對美國之威脅仍同於六〇年代甚小。此時美國除了預先手術攻擊中共核武所獲之利益外，又增加了另一可能利益與機會，即利用中共核武來制衡、牽制蘇聯。後者之利益在六〇年代末期美國逐漸喪失戰略優勢（Strategic Superiority），甚至連戰略均勢（Strategic Parity）都可能即將不保

註㉙ 這乃就質量而言。中共在首次試爆原子彈後，只花了兩年八個月氳彈就試爆成功，此一間隔較其他核武國短很多（美國隔了七年，蘇聯和美國隔了四年，法國隔了八年），且較法國還早發展出來。

註㉚ Robert S. Norris and Hans M. Kristensen, "Global Nuclear Stockpiles, 1945-2002,"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58, no.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 104.

註㉛ Jonathan D. Pollock, "China as a Nuclear Power," in William H. Overholt, ed., *Asia's Nuclear Futur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7), p. 55;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p. 159.

註㉜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Paragon House, 1987), p. 41.

的情況下，更具意義^㉙。在此一新戰略格局下，美國對於是否要繼續和中共敵對，因而多少仍會考慮對中共弱小、易毀的核武做預先手術攻擊，以根除未來可能的核武威脅；或者與中共和解，不須使用武力，而只要用外交手腕，即可利用中共來牽制軍力日益強大的蘇聯。美國在此二選擇上，顯然前者代價過大，又不能預估蘇聯的反應與世界輿論，且不符越戰所引起的國內反戰情緒，可說是充滿了高度的不確定性；而後者則不須費一兵一卒，即可能獲致重大外交、戰略利益。

然而，倘若美國本身無意再對中共核武做預先手術攻擊，則「默許」蘇聯對中共核武做預先手術攻擊之利益，是否較「不默許」，而與有核武的中共和解，並利用之來牽制蘇聯的利益要來得大呢？美國若是默許，其最大利益即未來不會出現一個可對美國構成潛在威脅的獨立核武強權（如目前），而且毛澤東控制下的中國顯然將更為反蘇。然而中共核武若被蘇聯摧毀，則上述利用中共以牽制蘇聯的利益幾已消失，畢竟一個無核武的中共，其傳統武力在面對其核武強鄰的軍事威脅下，不僅無何牽制作用，連是否足以自衛都是極大疑問，則蘇聯將可把其全部軍力用以對付西方。再者，美國即使僅默許蘇聯只能攻擊中共核武設施，但實亦難保蘇聯不會進一步以其昔日常用的「換其政府、佔其領土」之方式，扶持另一個親蘇政權，使中共「東歐化」。畢竟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殷鑒不遠，倘若在中國出現一個駐有蘇聯核武的親蘇政權，這顯然對於美國極為不利。更何況無核武的中共，基於安全考量可能需要尋求盟國，但若不願他國核武進駐而損其主權，在意識型態和地緣政治的考量下，和蘇聯結盟的可能性顯然高於和美國，則美國難保五〇年代中共「一面倒」向蘇聯的情況不會再發生。因此在中共核武對蘇聯之威脅日增，而美國的戰略優勢又即將不保之際，「默許」蘇聯對中共核武施以預先手術攻擊，不必然對美國較為有利。

直到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爆發時，中共和美國的關係似乎仍停留於過去二十年相互缺乏信任與了解的敵對狀態^㉚。然而此事件卻大大影響了美國對中共的評估，

註㉙ 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森總統上任一週後，提出「足量」（Sufficiency）之戰略概念，認為它優於「戰略優勢」，六月正式宣布開始籌劃十一月在赫爾辛基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這可說象徵著美國正式表示其無意再去維繫其二十多年來所擁有的「戰略優勢」，未來將進入一個尋求維持「戰略均勢」的時代。這就像季辛吉所言，可說是一個戰略性革命（Strategic Revolution）。Greville Rumble,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Defens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p. 117。在昔日美國的戰略優勢下，美國力足以對抗中、蘇共而有餘，足夠打「二個半戰爭」（至少在認知上如此認為），因此無須考慮中共等第三國因素即足以嚇阻蘇聯。然而當美軍於越戰受困，蘇聯戰略核武能力逼近，甚至即將超越美國之時，美國可能單單一個蘇聯便難以對抗，自然必須考慮多結盟以增加自己抗蘇的實力。日後美國已難以再像以前那樣利用其戰略優勢地位來達成政治目標，如古巴危機。為使國際穩定之維持，較少依賴由美國長期干預所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以及因應蘇聯不再處於戰略劣勢後，所可能產生向美國挑戰的更高意願，美國逐漸轉而較倚重外交手段，來維持其圍堵政策的繼續運作。

註㉚ 一九六九年三月尼克森宣布「衛兵型」（Safeguard）反彈道飛彈（Anti-Ballistic Missile, ABM）計劃，所用理由和六七年的「哨兵型」（Sentinel）ABM 體系一樣，主要乃針對中共未來可能的核武威脅。尼克森說：「我們不能忽視中共對我們的威脅，和遭受意外攻擊的危險，有了此一防衛體系，一旦我們在七〇年代遭受中共核武攻擊，或任何一國的意外攻擊時，將美國傷亡減至最低程度。」而就中共的立場，最糟糕的還在後面，尼克森接著暗示美、蘇兩國共同希望遏阻中共的勢力：「我想蘇聯也和我們一樣，不願意讓他們國家曝露在潛在的中共威脅之下。」果然在二日後中共「新華社」指責這是美國「與蘇聯陰謀勾結，對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進行核子攻擊與核子勒索。」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170.

使之確信中、蘇共分裂並非作戲且難再復合，並不再視中共為蘇聯旗下的一員，改而認為中共乃一獨立的角色。林彪在四月中共九大的報告說：「決不可忽略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季辛吉認為這代表中共將美、蘇列為同等的威脅，符合三角外交關係的先決條件：「美國不是中共唯一的主要敵人」^①。此外，美國可說亦確信至少在短期內，中共核武實力的成長所構成的威脅，對蘇聯而言是更大的威脅，若和美國相較起來。這對六〇年代末期西方對中共角色之評估的關鍵性轉變，多少有其影響^②。

八月在中、蘇邊境仍然緊張之際，尼克森在國安會上提出了被季辛吉視為革命性的觀點：「蘇聯是較具侵略性的一方（和中共比起來），如果我們讓中共在中、蘇戰爭中被擊潰，並不符合我們的利益。」^③季辛吉亦言：「我們不能漠視蘇聯攻擊中共，這會破壞全球權力平衡，會在全世界造成蘇聯將居統治地位的印象。」^④美國「不默許」蘇聯預先手術攻擊之訊息，在蘇聯駐美大使的謹慎探詢下，亦已傳達給蘇聯領袖^⑤。十一月尼克森在關島提出的「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其中一個重點是：「如果一個核武強國威脅到我們盟邦的自由，或者威脅到我們認為其存在對我們安全極為重要（Vital）的國家，美國必予以保護。」後一類國家在當時中、蘇共關係正處緊張之時，及該文所暗示的涵意，很明顯是指中共^⑥。這不僅公開、明白的表示美國「不默許」蘇聯對中共的進攻，甚至還暗示美國將保護中共。

因此利用中、蘇共分裂，打「中國牌」以牽制蘇聯，便成為七〇年代初美國全球戰略之一大轉變，在季辛吉的規劃下，「權力平衡」的時代可說再度來臨。當時美國的低盪（détente）政策之對象雖有二個：中共和蘇聯，然而和中共緊張關係的緩和或許方是其中最重要的，甚至是緩和與蘇聯緊張關係的先決條件^⑦。這在七〇年代蘇聯開始擁有全球軍事投射能力，以及如昔日戰略優勢時期使用武力約束蘇聯的危險大增的情況下，尤為重要。而當時世界上足以用來牽制蘇聯的，可能亦只有中共而已，因為中共乃兩超強外，唯一擁有充分獨立的核武力量，而且又和蘇聯相鄰；此外中國的「難以征服性」與承受核武摧毀的高忍受度，均象徵著中共在全球權力平衡中具有獨立的戰略價值，此乃英、法等國所無的^⑧。由一九六九年以後蘇聯近三分之一的核武

註① Ibid., p. 176.

註② Gerald Segal, "China," in Regina C. Karp, ed., *Security with Nuclear Weapons?—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PRI, 1991), p. 196.

註③ 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182.

註④ Ibid., pp. 185~186.

註⑤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pp. 285~286.

註⑥ Richard C. Thornton, "Strategic Change and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erceptions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in Il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p. 58.

註⑦ 因為如此方可增加美國的本錢，提高蘇聯合作的壓力。參見：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88), p. 199.

註⑧ Gerald Seg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in Gerald Segal, ed., *The China Factor: Peking and the Superpower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82), p. 10.

用以對付中共^⑩，更可實際看出中共的牽制作用。

就中共而言，一九六九年的中、蘇邊界軍事衝突，及美軍開始撤出越南，使中共內部以周恩來為首的「聯美制蘇」派勢力高漲，逐漸整合了中共內部決策者的意見，視蘇聯為「立即的」最大威脅。而珍寶島事件或許促使中共領導者較現實地認知到其實力可能連一個超強都敵不過了，因此有必要認真思考是否應放棄六〇年代末期和兩超強同時為敵的不利局面，尋求改變其對外政策與嚇阻態勢，以求獲得美國至少不會與蘇聯串通的保證。因此中共和美國之間的「準聯盟」（Quasi-Alliance）關係可說逐漸開展起來。

至於蘇聯，對於向中共核武做「預先手術攻擊」之有限時間與機會的日益流逝，與中共核武威脅之持續增長，則日漸感到憂慮。據 Robert Sutter 的觀察，六〇和七〇年代的蘇聯領導人經常論及中共有可能使用其核武的「不理性行爲」，可見蘇聯感到中共在必須時，可能將有此「意志」去使用其核武^⑪。因此一九六九年以後，更是日益增兵中、蘇邊界，從一九六九年起至一九七八年，蘇軍數量就增加了 80 %^⑫。而中共軍力上的劣勢，或許反而使蘇聯必須做如下考慮：美國在和中共改善關係後，可能願意將其核保護傘的間接保護延伸至中國大陸，以減緩唯一有意對中共核武做「預先手術攻擊」的蘇聯威脅。

因此誠如季辛吉所言：「到一九六九年底中共、美、蘇三角外交之局面方真正成立」^⑬，一個「三角世界」的戰略、外交邏輯方充分表現出來。在這之前，中共可能未曾被美、蘇接受為一重要且可信的世界性角色^⑭，然而六〇年代末期中共之所以逐漸獲有此一地位，核武顯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⑮。當中共核武發展到六〇年代末期，對美、蘇所構成之威脅程度的差距日益明顯之際，美國應當清楚了解當時中共核武對蘇聯的威脅遠大於對美國。而中共核武發展初期易誘致預先手術攻擊的威脅，亦因美國政策的轉變，而逐漸只剩蘇聯有此意圖與能力。這多少促使中共尋求美國的間接保護，或至少尋求獲得美國承諾不與蘇聯聯手的保證。因此中共核武發展對「戰略三角」雛形的出現，實有不容忽視的催化作用，而珍寶島事件則是促使此一影響顯現出來的導火線。

註^⑩ Gerald Segal,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in Gerald Segal, ed., *The China Factor: Peking and the Superpowers*, p. 52.

註^⑪ 引自：Harlan W. Jencks, "PRC Nuclear and Space Program," in *SCPS Yearbook on PLA Affairs, 1987* (Kaohsiung, Taiwa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988), p. 109.

註^⑫ Gerald Segal,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p. 52.

註^⑬ 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191.

註^⑭ Jonathan D. Pollock, "China and the Global Strategic Balance,"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4.

註^⑮ 誠如波拉克（J. Pollack）所言：「中共之核武發展使他國對中共權力的認知上有特別重要的影響，因為此種武器很少國家有，且沒人敢用它，基於此種武器的特殊性，將使核武國在世界上另成一類，……這有助使中共成為一可信的世界強權（credible world power），特別是在兩核武超強的眼中。」*Ibid.*, pp. 171~172。倘若中共沒有可威脅蘇聯本土的核武，其傳統武力在蘇聯威脅下，能否自保都成問題，更不用談牽制了。

(二) 中共在七〇年代「戰略三角」中的角色—核武的影響

七〇年代初期逐漸明確形成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戰略三角」關係中^④，中共之所以得以在戰略三角中扮演具有戰略性的一角，其核武發展的影響實不容忽視。這一方面乃由於「戰略均勢」時代的到來，如何維繫以「相互保證摧毀」為基礎的「戰略穩定」（Strategic Stability），及防止蘇聯獲得戰略優勢，便成為日後美國戰略、外交上的重要目標^⑤。此一奠基于「嚇阻」之上的「穩定」，亦是由心理「認知」所決定。若將穩定視為一種「不變」的狀態，則在冷戰下的「零和遊戲」中，即使是對方獲取的小小利益，亦將被視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⑥。誠如尼克森所言：「所謂均勢……就軍事而言，其意義是蘇聯必須沒有贏得美國的戰爭能力；就政治而言，其意義是蘇聯領袖們不應認為在他們和美國的對抗中，他們將對美國享有一種戰略核武優勢，而任何其他國家的領袖們也不應認知蘇聯具有此種利益。」^⑦在核武難被使用的情況下，後者之「認知」問題實最為關鍵，它影響到他國對美國權力的看法，及美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美國前國防部長布朗（H. Brown）便曾言：「很多國家喜歡將我們和蘇聯的力量做比較性的判斷，這些國家的行為將受其對核武平衡之判斷的影響，因此擁有

註④ 「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一詞一直是一個受爭議的概念，究竟它是否存在？以及中共是否具有資格作為一「角」？而中共在「戰略三角」中又扮演著如何之角色？此些問題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均有不同之看法。誠如前言所言，本文主要乃以核武議題之探討上最常用的「最壞情境分析」，就核武實力進展的角度探討中共對外關係的演變。五〇年代早期，中美蘇三角關係或許已為國際體系之一重要因素，但一般認為具有戰略意義的「戰略三角」關係之真正形成卻是在七〇年代初期。參見 Thomas W. Robinson, "On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in Il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p. 4 及其後之分析。

註⑤ 一九七二年ABM條約和SALT I條約的同時簽定，其目的即在藉由維持美、蘇的戰略均勢，及確保雙方報復能力的不易毀滅性，以降低第一擊的戰略誘因，而維持戰略穩定，避免雙方採用或誤會對方採用第一擊的戰略，而首先使用戰略性核武攻擊彼此的本土。依 ABM 條約的邏輯，無法完善的飛彈防禦並不能帶來絕對安全或重獲無條件的生存能力，但由於將有損雙方「相互保證摧毀」的相互性，而被認為將動搖雙方嚇阻關係的穩定性。因此藉由「防禦」的放棄，來確保相互攻擊性嚇阻能力，以維持恐怖平衡和恐怖和平，乃一九七二年之後西方的主要政策。在六〇年代末期以前，此一「戰略穩定」乃由美國的戰略優勢來維持，誠如尼克森所言：「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的戰略優勢對我們和整個自由世界都非常有用。它是我們政治重量的重心，它是使我們能用傳統武力來達成政治目標的王牌。」Richard Nixon, *The Real War*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0), p. 165.

註⑥ Paul Stockton, *Strategic Stability between the Super-Power*. Adelphi Paper no. 213 (London: IISS, 1986), p. 6; Wolfgang Heisenberg,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Nuclear Deterrence in East-West Relation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ecurity Studies, 1989), p. 34.

註⑦ Richard Nixon, *The Real War*, p. 154. 「均勢」此一西方所創的名詞，像國家安全或利益等常用詞彙般，一直難有統一且明確的定義，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的此一解釋或許是最具權威性的。

和蘇聯基本上對等（essential equivalence）的戰略部隊，便特別重要。」^④

因此七〇年代初期開始的戰略核武均勢可視為一種重要心理因素，而能產生決定性影響。然而戰略均勢的評估卻是極為複雜而難以定出精確標準^⑤，因此唯一看得到的「數量比」便具有重大之象徵意義，照尼克森的講法：「除了簡單地應有一樣多的重量（weight），一樣多的彈頭，一樣多的飛彈載具外，美國兵力也要有和蘇聯兵力一樣多的彈性和精確程度，而且還要讓他人覺得如此。」^⑥此外，一九七二年美、蘇又簽定ABM條約，規定雙方只能在一處部署ABM系統，藉放棄防禦來保證以雙方第二擊報復能力為基礎的「戰略穩定」^⑦。在此約的約束下，美、蘇兩國本土對彈道飛彈可說均處於不設防狀態，這對其他中型核武國之核嚇阻力量的可信度甚有助益。

在美、蘇以戰略核武「數量比」為基礎的戰略均勢架構下，中共核武日益成長所形成的獨立戰略價值，相對下實力雖小，但對兩超強戰略均勢的影響卻不容忽視。七〇年代中共核武幾乎以蘇聯為唯一對象，由於兩國相鄰，使中共核武對蘇聯而言，可說都是足以威脅本土的戰略性武器。中共雖然尚未具第二擊報復力，但中共若對蘇聯施以第一擊，它對蘇聯的損害，至少在「認知」上仍可能使蘇聯處於「戰略劣勢」，這在ABM條約對蘇聯飛彈防禦措施的限制下尤為可能。而且蘇聯亦不能不考慮中共核武在未來可能的美、蘇核戰中，將會支持何方。尤其是中共在毛澤東時代向來對武力

註^④ 引自Keith B. Payne著，陳奎良譯，美蘇關係中的核子嚇阻問題（台北：黎明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頁一六七。尤其是西方認為，蘇聯向來將核武視為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而「戰略優勢」在美、蘇競爭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效果，享有優勢的一方，將是較為容易冒戰爭危險，以及更為願意接受戰爭昇高後果的一方，因此能夠迫使其對手採取更為謹慎的外交政策，而劣勢的一方則無法做到此點。因此七〇年代初期開始的戰略核武均勢，已除去六〇年代末期以前蘇聯在外交上的嚴重約束，而美國已失去和蘇聯打交道時以「強勢地位」發言的資格。如果蘇聯再獲得戰略優勢，它可能產生一些延伸政治效果，有助使蘇聯可以更為主動與積極地支援各國革命的進行，而美國支持他國反抗革命過程的干預行動將大受抑制，而美國核保護傘對其盟邦「延伸嚇阻」（Extended Deterrence）的可信度亦可能大受影響。尼克森曾論道：「假使蘇聯獲得戰略優勢，則她在鐵幕之外將更敢於使用權力，如果蘇聯握有戰略核武優勢，她將掌握戰爭昇高的威脅。因此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領袖們將會做此結論：美國將比較不願意用軍事力量來反對蘇聯的擴張行動，因此在和蘇聯的對抗中，態度將會變得日益不堅決。」Richard Nixon, *The Real War*, p. 165。有關蘇聯對戰略穩定、優勢、均勢的看法，參見Peter Vigor, "Western Perceptions of Soviet Strategic Thought and Doctrine," in Gregory Flynn, ed.,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and Western Polic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79-90.

註^⑤ 有關均勢的評估方式有多種，如載具數、彈頭數、彈頭噸位數、飛彈投擲負荷量、精確度等等多種計算方式，參見William H. Bough,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Balance* (New York & London: Longman, 1984), Cha. 4, "Assessing the Strategic Balance," pp. 122-125.

註^⑥ Richard Nixon, *The Real War*, p. 154。而後者「還要讓他人覺得如此」可說尤為重要，因為戰略均勢可說是一種「認知」問題，此一認知受上述戰略核武之「數量比」的影響甚大。

註^⑦ 一九七二年ABM條約規定雙方只能在首都及一個ICBM基地這兩處部署ABM系統，一九七四年雙方之議定書又改為只能有一處，蘇聯選擇首都莫斯科，美國選擇一處ICBM基地。但美國後來認為無用處而放棄部署。有關ABM條約之影響與後續發展，參見Antonia H. Chayes and Paul Doty, *Defending Deterrence: Managing the ABM Treaty Regime into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ergamon-Brassey's, 1989).

的使用表現出高度的意志，她乃核子時代唯一曾和兩大核武超強都打過仗的國家，這或許更增加其核武的影響力。因此七、八〇年代蘇聯有近三分之一的核武以中共為目標，這自然對影響國際情勢甚鉅的「戰略均勢」有所影響。它或許不致影響美、蘇雙方第二擊報復能力的對比，或使何方獲得第一擊能力，但其獨立之嚇阻力量若支持美國，仍可能使蘇聯處於數量劣勢。此數量差距雖然不大，但它卻具有重要的象徵性或心理性效果，影響美、蘇間之政治關係，甚至也會影響美、蘇和其他國家的關係^{③3}。

蘇聯面對中共核武成長而日增的威脅，以及得以永除後患的預先手術攻擊的時間日漸流逝，難免感到憂慮，但又猶豫不決難下決定，使七〇年代蘇聯和中共的關係在「預先手術攻擊」之心結下難以化解。而中共核武亦使蘇聯面臨其向來所擔心的「兩面作戰」問題，不論日後任何和西方之間的危機，都會使蘇聯不斷面臨著和中共作戰的可能性，及其伴隨而來的核威脅，使蘇聯必須預留部分核武以對付中共。至於美國，則由於可以幫助中共減緩易毀核武所可能誘致蘇聯預先手術攻擊的威脅，而得以在三角中左右逢源，居於有利地位，並使蘇聯處於可能遭美國、中共聯手對付之的不利地位。因此，中共此一足以威脅蘇聯本土，但尚不及美國本土的核武實力，有助於使中共在「戰略三角」中扮演一個不很夠力，但或許可以幫助美國牽制蘇聯，而影響以核武為基的戰略均勢的角色^{③4}。不論美、蘇那一個超強，均需要考慮其對手和中共的任何交往所代表的意義，及它所產生對美、蘇雙邊關係的影響。

至於中共，在七〇年代則需要美國的間接保護，或至少獲得美國不與蘇聯聯手的承諾，以使中共能儘快安然渡過其核武發展初期所易誘致預先手術攻擊的最大易毀期。在蘇聯預先手術攻擊之威脅所致中、蘇共的不信任感與緊張下，這自然影響中共改變同時反美反蘇的政策，而於七〇年代初改採親美以制蘇的政策，這亦使蘇聯在決定是否要攻擊中共時必須考慮到美國立場。此外，中共之核武或許亦有助於增進美、蘇、

註^{③3} 我們由七〇年代美、蘇 SALT 談判過程中，亦可看出中共因素之日益加重。Lewis 在一九七三年訪問蘇聯與中共後，便認為中共在 SALT 談判過程中實為一「靜默的夥伴」（silent partner），中共的核武實力多少在談判過程中影響了兩超強的戰略計算。而七〇年代初以來，中共和美國之關係的復甦，多少亦促使蘇聯有更高的意願與美國談判 SALT，以緩和美、蘇之關係。John Wilson Lewis, "China as Silent Partner," *New York Times*, Nov. 19 (col. 2, 1973), p. 35; 引自 John Wilson Lewis, "China's Military Doctrines and Force Posture," in Thomas Fingar, ed., *Chin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 Policy Evolution in the 1970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0), p. 129。至於在 SALT II 的某些談判階段中，美、蘇便常討論中共因素，而一九七九年中共和美國之「建交」，亦曾延遲當時即將達成的協議。Gerald Segal,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p. 50。在 SALT II 條約簽訂時，蘇聯亦明白表示，在未來 SALT III 中必須討論中共因素，及其對戰略平衡的影響。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SALT II 條約簽訂後，蘇聯外長葛羅米柯(Gromyko)在記者會中便宣稱：「美、蘇之間的 SALT 談判已至一瓶頸，只存在於此二國之間的談判是不足夠的，其他核武強權的參與乃是必須的。……若不將所有針對蘇聯的戰略力量納入，日後之談判將無成功的機會。」*Le Monde*, Paris, June 27, 1979, p. 2. SALT 談判的對象是戰略核武，倘若中共沒有核武，顯然難以造成上述影響。

註^{③4} Gregory Treverton, "China's Nuclear Forces and the Stability of Soviet-American Deterrence," in Bertram Christoph, ed.,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Deterrence* (London: IISS,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p. 42.

中共三角關係的穩定，這一方面由於中共的核武使蘇聯對是否要和中共衝突的決定更為謹慎；另一方面或許亦有助於嚇阻擔憂兩面夾擊的蘇聯對北約或美國的攻擊^{⑤5}。

因此六〇年代末期以後，中共核武發展對美、蘇之威脅所日益顯示出的差距，及美國戰略優勢的喪失，使中共核武的獨立戰略價值顯示出其重要性，有助使美國重視中共之角色，利用美國和中共關係之復甦，來促進美、蘇和解之進展。但它亦引起蘇聯對美國和中共聯手對付她的疑慮，而加深美、蘇間的猜忌。因此三角關係的衝突與合作，雖然未必全因核武均勢的變化而發展，但中共核武地位的提昇，顯然影響了各方對中、蘇共衝突的評估，而這也正是本文一再強調的核武、外交和戰略環境三者之互動關係。

四、核武已脫離手術攻擊之威脅，且亦可 威脅美國本土的時期—八〇年代初期 以後的既定戰略架構

有關中共核武實力進展對其外在戰略環境之影響，最重要的問題即中共核武何時獲致得以存活於敵人預先手術攻擊的實力呢？且存活的核武是否能予敵人有效的報復？這些問題除非經由實戰，否則難有精確答案。它一方面涉及其本身實力狀況，另一方面亦涉及他國和本身的認知，而後者之影響尤大，因為其對外政策及和他國之互動乃基於此認知而制定。但這些「認知」除非如西方那麼開放，否則難以確實獲知；而且這在各決策者和學者之間，可能還有不同評估。然而雖然難以給予明確答案，但基於此問題的重要性，仍有加以探討的學術價值。

高爾登（Peter J. Gordon）認為中共在七〇年代早期，就已獲得一「可信的報復反擊力量」（A Credible Retaliatory Strike Force）^{⑤6}。而一九七三年五月華盛頓郵報記者採訪周恩來後，曾報導說：「周總理對蘇聯不敢跨過北方邊界入侵此點，已有所信心，此一主要威脅已被嚇阻住。此一嚇阻之所以能夠成功，一方面是由於外交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其大力備戰，快速的核武導彈之發展，及深挖洞措施的成果。」其政治意味雖濃，但多少顯示出中共對其核武之嚇阻力量已有點信心^{⑤7}。一九七六年一月美國參謀聯席會議主席布朗（George S. Brown）曾在國會聽證會指出：「中共的戰略武力雖小，但卻是謹慎構思出來的戰略計劃之結果。一個用以對抗蘇聯的小型、但可信的核武報復能力已經被獲致。」這可說是美國官方對中共核武是否已獲致報復能力之最早的公開評判^{⑤8}。一九七八年杭特（Hunt K.）亦言：「中共的核武可能已經

註^{⑤5} Allen S. Whiting, "China and the Superpowers: Toward the Year 2000," *Daedalus*, vol. 109, no. 4 (Fall 1980), p. 100.

註^{⑤6} Peter J. Gordon, "The Politics of Implementing China's Nuclear Doctrine, Part II, 1969-Present,"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8, no. 2 (Summer 1989), p. 20.

註^{⑤7} Jonathan D. Pollock, "China as a Nuclear Power," p. 66.

註^{⑤8} *Ibid.*, p. 52.

通過在面臨蘇聯預先攻擊時的最大易毀期。」^④而照 Luttwak E.一九七九年的判斷：「不再有何理性的莫斯科領導人會相信能夠一次摧毀中共全部的核武。」^⑤一九八〇年美國國防部情報局長在國會聽證會上亦繼續認為中共的「最低嚇阻」（Minimum deterrence）是可信的^⑥。

至於中共對自身所擁有的可殘存於敵人第一擊的核武報復能力的自信，最具權威的證據或許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所提到的一段話：「我們有一點核武器，法國也有一點，這本身就是壓力作用。你有，我也有，你要毀滅我們，你自己也要受到點報復。」^⑦而中共在一九八二年一般視之為「可信的第二擊武器」的潛射導彈（SLBM）試射成功後，不論是西方或中共，大多已評估中共之核武已具有可存活性。因此倘若我們認為中共在八〇年代初，已逐漸擁有或被認知擁有可殘存於敵人第一擊的核武報復能力，這應是可以接受的。此一能力的獲致，使中共脫離其核武發展初期所易遭致敵人對其核武做預先手術攻擊的「誘惑時期」。

此外，一九八〇年射程達一萬三千公里的東風五號洲際導彈試射成功，這在理論上已足以威脅到美國本土。至於中共潛射導彈雖然只有約三千公里的射程，但誠如美國一海軍軍官所言：「如果中共再次把美國看做一個潛在的威脅，她就可能派其彈道導彈潛艇到東太平洋活動。這樣在中美戰略關係中，中國海軍將第一次處於擁有打擊美國領土能力的地位。」^⑧因此中共核武這隻獨立的戰略力量到了八〇年代，不再是只能影響蘇聯而已，亦開始可以影響美國在戰略均勢中的地位。這使得「戰略三角」中，中共核武對其角色的影響又有了重要變遷。

由於中共核武已逐漸脫離蘇聯預先手術攻擊的危險，這自然使中共在面對蘇聯之威脅時有更大之自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大三中全會以後，認為大戰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避免與推遲的，這可說主要是針對蘇聯之威脅而言。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十年來首次主動提議討論「正常化」問題，而逐漸開始的中、蘇共關係正常化^⑨；以及八〇年代初，不再視蘇聯為「立即的」威脅^⑩，這雖然主要是受鄧小平上台的影響，

註^④ William C. Green and David S. Yost, "Soviet Military Options Regarding China," in Douglas T. Stuart and William T. Tow, ed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p. 137.

註^⑤ *Ibid.*, p. 138.

註^⑥ Alastair I. Johnston, "Chinese Nuclear Force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 for Arms Control,"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2, no. 2 (June 1983), p. 25.

註^⑦ 張進喜、王顯存，「毛澤東軍事思想與我國的核戰略理論」，《軍事知識》（北京），一九八八年五月，頁五。

註^⑧ 美國一海軍軍官戴維·馬勒所言。文匯報（香港），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三版，譯自美國海軍學會會報。

註^⑨ 雖然亦有人認為一九八二年布里茲烈夫的塔什干宣言，乃是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的開始，但本文採用蘇起教授的觀點，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十年來首次提議討論「正常化」問題後，便已開始。參見蘇起，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1979-1989）（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一年），頁三九。

註^⑩ Xiaochuan Zhang, "China's Nuclear Strategy," in Yufan Hao and Guocang Huan, eds.,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p. 79.而 Jencks 更明確的指出在一九八一年左右，見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 105.

但中共核武成長所予其政權安全日增的正面意義，實亦不容忽視。在八〇年代初期中共核武已逐漸擁有「第二擊核武報復能力」後，這或許使得中共自建立政權以來，首次感到可以獨自保衛自己的安全，不再需要過於依賴任何外在強權的直接或間接保護，例如七〇年代和美國的安全關係。

至於可威脅美國本土的東風五號，原本早已發展出來，且一九七九年可能已先量產了^⑯，但一直未試射。這一方面或許是受文革之干擾，然而多少亦可能是在中共核武尚未獲致第二擊報復能力以前，為避免刺激美國，以防其和蘇聯聯手，或默視蘇聯對付中共。一九八〇年東風五號的試射，多少象徵著中共改變了其七〇年代純粹反蘇的單面向嚇阻姿態，代表著中共日後將開始更為平等地看待蘇、美兩超強的潛在威脅^⑰。這多少是受到其核武易誘致「預先手術攻擊」的威脅已大為減少所影響，使中共的安全較不須依賴美國。上述種種對於中共一九八二年「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提出與強調，及對美、蘇關係逐漸改採較為等距的態度，實有不容忽視的影響^⑱。

至於ICBM和SLBM的發展，使中共核武不再是只能威脅蘇聯而已，亦開始可以威脅美國本土，對美國在戰略平衡中的地位也開始有所影響，這亦給予蘇聯有了「打中共牌」以牽制美國的可能利益和機會。隨著中、蘇共「預先手術攻擊」心結的逐漸消失，這多少有助於促進八〇年代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開展。而中共在「戰略三角」中的角色，則因其核武亦逐漸可被蘇聯用來牽制美國，而增加其制衡之作用，這或許亦有助提昇中共在戰略三角中之地位。例如在八〇年代上半葉美、蘇「新冷戰」的緊張關係下，中共可說取代了美國在七〇年代戰略三角關係中的「左右逢源」角色。

此外，在六、七〇年代中共核武已可威脅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基地時，由於美國向來十分重視核門檻（Nuclear Threshold）的象徵意義，因此對美國予其亞洲盟國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多少已有所影響^⑲。然而到了一九八〇年進而逐漸得以威脅到美國本土之後，此一影響更形加大，這使美國的亞洲盟邦亦有需要如西歐國家般思考一個問題：當中共與其作戰時，美國是否願用紐約或夏威夷被摧毀的代價，來保護東京、漢城呢？這對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甚深的台灣而言，更具意義。中共現今約略二十枚足以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飛彈的實力，可說是美國對台踐履其安全承諾時的一大顧慮。最明顯的例子即一九九五～九六年的台海飛彈危機時，面對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至台海，據傳中共負責和美國軍事交流的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當時便曾告訴前往北京訪

^{註⑯} John W. Lewis and Litai Xue, *China Build the Bomb*, p. 214.

^{註⑰} Gerald Segal, "China's Strategic Posture and the Great-Power Triangle," *Pacific Affairs*, vol. 53, no. 4 (Winter 1980-1), p. 684.

^{註⑱} 誠如法國前總統戴高樂所言：「一個國家若缺乏核武，則無想像中的獨立，此國勢必將其安全與政策，托付給擁有核武的國家。」中共如果沒有發展出足以脫離他國預先手術攻擊的核報復能力，其國家安全實難以自立，更遑論獨立自主的外交。Charles de Gaulle, "Allocution du 3 novembre 1959 à l'Ecole militaire," *Discours et messages Tome: 4, Pour l'effort, 1962-1965* (Paris: Plon, 1970), p. 85.

^{註⑲} Yueh-Yun Liu, *China as a Nuclear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2), p. 58. 韓戰及越戰乃明顯的兩個例子，美國在此二戰爭中，均避免將軍事行動擴大到有核國（蘇聯、中共）的領土，即使深知他們對其敵軍之補給有重大作用。

問的美國前國防部官員傅立民（Charles Freeman）：美國不會在與中共的任何衝突中防衛台灣，因為它「對洛杉磯的關切甚於對台北的關切」。這自然是指中共核武對美國本土的威脅，而此威脅似乎亦為華盛頓所明顯認知到，此段話會被美國一些官方報告引用，如一九九八年的飛彈威脅評估及一九九九年的寇克斯（Cox）報告^①。美國對台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多少受中共此一得以攻擊美國本土的核武實力的影響，這實為目前美「中」台安全關係之既定架構。

伍、結論—後 ABM 條約時代的展望

經由上述之分析，中共核武實力之發展對其在冷戰時期對外關係的演變實有不容忽視的影響。然而此一敏感影響，在美、蘇各國及中共本身均有意予以壓低的情況下，中共核武實力發展一直是探討中共對外關係時常被忽略的一因素。相當程度上乃因擁有了核武，方便中共在核子時代地緣政治上的優點顯現出重要影響。此一影響亦將隨日後相關官方文獻的逐漸解禁，而得以更進一步釐清^②。

冷戰結束後，美國逐漸被中共視為主要對手，上述目前既定的美「中」戰略架構，有可能因二〇〇二年六月美國退出 ABM 條約及積極研發部署 NMD 而有所轉變。長期以來，中共所擁有的約四百枚彈頭的核武，面對美、俄上萬枚彈頭的核武實力^③，北京之所以仍自認能建構出一支可信的嚇阻及報復能力，主要乃是由於 ABM 條約的約束使美、俄本土對彈道飛彈幾乎處於不設防狀態。由於中共目前約二十枚能攻擊到美國本土的洲際導彈可能大半被 NMD 所抵銷，如此將使中共擔心美國是否將因 NMD 的部署，而重新獲致對中共發動第一擊的實力，使中共再度須面對其核武發展初期的

註^①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5, 1998) and Christopher Cox et 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Commercial Concer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x Report)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 105-851 Declassified Report Release Date: May 1999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 p. 193. 另外據傳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顧問萊斯亦曾面告來訪的中共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美國無法接受他一九九五年以核武威脅洛杉磯的說法。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七版。引自華盛頓時報 (*Washington Times*) 十二月十一日的報導。

註^② 由於核武議題的敏感性，及中共官方至今仍幾乎完全封鎖其核武發展之資訊，使得此議題的研究在資料取得上仍存相當困難。本文在論證資料的運用上以西方評估為主，所獲之研究成果仍有其侷限性。日後隨著中共、美、蘇之官方資料的逐漸解禁，或藉由在大陸和相關學者專家的訪談，或許可獲致較本文更為精確的分析，這是作者及日後有興趣探究此議題者值得繼續努力的方向。本文之研究成果雖因資料限制而仍有其侷限性，然而在相關研究成果似乎仍不多的情況下，希望仍能對此一在學術上不應被忽略的重要議題做出拋磚引玉的貢獻。

註^③ 依據下文的估計，中共自八〇年代末期至二〇〇二年，均大約維持四百至四百五十枚核彈頭。而美、俄在冷戰剛結束時，核彈頭數量均高過二萬枚，二〇〇二年美國仍存一萬六百枚，俄國則存八千六百枚。參見 Robert S. Norris and Hans M. Kristensen, "Nuclear Notebook: Global Nuclear Stockpiles, 1945-2002,"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58, no. 6 (Nov./Dec. 2002), pp. 103~104.

「預先手術式清除其核武」之威脅的可能性，這對中共和美國的戰略關係將造成重大衝擊^⑦。

因此中共過去一再警告，ABM 條約乃全球裁武機制的基石，此基石若受損，北京將重新考量過去所做過的裁武承諾^⑧。中共若要避免此種威脅，似乎亦只有增加其核武數量一途而已。長期以來，大陸具官方色彩的專家學者便多次指出，NMD 將使中共增加其核武數量及研發多彈頭導彈，而多項研究亦指出中共其實可以輕意地二、三倍其核武數量^⑨。雖然不少美國學者指出美國即使不部署 NMD，中共亦將繼續其核武現代化。然而中共長期以來的核武發展政策乃重質不重量，倘若因 NMD 而改採質量並進的政策，其核武數量的增長對區域及國際安全仍將造成不小衝擊^⑩。而且未來十至十五年中共第二代核武即將逐漸完成，就目前之發展來看，新一代核武的重心，如〇九四核潛艇的導彈（8000km）或新一代洲際飛彈，十分明顯主要是針對美國的^⑪。

如果 ABM 條約體制的瓦解導致中共增加其核武數量，這對美國予台灣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當然會造成影響。而此發展所可能引發的骨牌效應亦是目前令人擔憂之事，若因此予印度增強其核武實力的藉口，亦將使巴基斯坦跟進，而北韓、日本、南韓之間或許亦可能出現此效應，尤其是近來北韓核武危機再度惡化之際。然而，倘若美國

註⑦ Alan D. Romberg and Michael McDevitt, eds., *China and Missile Defense: Managing U.S. PRC Strategi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時殷弘，「美國國家導彈防禦計劃與中國的對策」，《中國外交》(北京)，二〇〇二年七月第七期，頁四七～五一。

註⑧ 中共外交部軍控司司長沙祖康曾言：「儘管中方不想走這一步，但如果形勢所迫，中方很可能不得不重新審議在包括FMCT(禁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談判在內的一系列軍控、裁軍和防擴散問題上的政策。」沙祖康，「導彈防禦系統真能增進安全嗎？—軍控司司長沙祖康在第二屆中美軍控研討會上的發言」(1999/04/28) 中共外交部網頁 (<http://211.99.196.217:89/gate/big5/www.fmprc.gov.cn/chn/1469.html>; accessed 20030812)。

註⑨ Banning N. Garrett and Bonnie S. Glaser,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 (Winter 1995/96), p. 74.

註⑩ 過去美國對中共核飛彈對其本土的威脅評估，大多認為未來十至十五年將達「數十枚」。然而在美國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宣布將退出ABM 條約後，在其隨後所公布的最新一份飛彈威脅評估中，美國則改而使用「在二〇一五年可能擁有七十五到一百枚」的評估。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oreign missile developments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hrough 2015 (Dec. 2001) (http://www.cia.gov/nic/pubs/other_products/_Unclassifiedballisticmissilefinal.pdf; accessed 20030812)。美國二〇〇三年的「中共軍力報告」則評估：「此一得以攻擊美國的 ICBM，到二〇〇五年可達三〇枚，而二〇一〇年前可能達到六〇枚。」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PRC, 2003 (July 28, 2003), p. 31.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20030730chinaex.pdf>; accessed 20030801)。

註⑪ 有關中共第二代核武的發展，參見 Hans M. Kristensen, "Chinese nuclear forces, January 2003," *SIPRI Yearbook 2003: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http://projects.sipri.se/nuclear/china.pdf>; accessed 20030812).

部署的NMD能大幅抵銷中共核武對美國本土的威脅，這亦能使美國在履行其對台之安全承諾時，較不受北京的核訛詐，而有助提昇美國對台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上述中共核武實力的繼續進展，和美國「延伸嚇阻」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飛彈防禦，及不擴散機制之間的關連，未來將如何發展及影響中共對外關係、東亞戰略格局及兩岸安全關係，實為日後值得關注之一發展。

* * *



PRC's Nuclear Force Developm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External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Era

Shih-min Chen

Abstract

United States, Russia, PRC and other countries' intention to undermine PRC's nuclear force development's affect towards its external relations, had been the main cause of this issue's long-term neglect. Due to Chinese nuclear forces' easily destruction and unsteadiness, before the end of 1970's, PRC holds the threat of preemptive surgical strike towards it's nuclear force. Before the late 1960's, the U.S and Russia had the ability and interest to strike, which gave the PRC reason to fear the possible collusion by two superpowers to attack. Not until the early 1970's, the U.S begin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C's strategic position. The PRC's depended on the U.S for indirect protection,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S-China normalization in the 1970'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strategic triangle. After the early 1980's, the PRC gradually attained nuclear weapons and no longer required indirect protection from the U.S. The PRC's nuclear force also gained the ability to threat on U.S. territory. These developments gave Moscow the chance to use the PRC to restrain the U.S. Which assisted in the to promoting of the PRC's Russia relating adapting a more independent diplomacy. The abolishment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had cause Peking government to worry whether U.S will once again attain the ability of first strike towards PRC.

Keywords: Chinese nuclear forc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o-Soviet Relations; Strategic triangle



參考文獻

- 丁樹範(1989)，「演變中的中共戰略核子武力」，《中國大陸研究》，32：2，51-58。
- 毛澤東(1977)：「原子彈嚇不倒中國人民」，《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36-137。
- 毛澤東(1977)：「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99-500。
- 毛澤東(1969)，《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一輯，中共內部印發。
- 王振平(1989)，「亞太地區軍事形勢的發展對第二砲兵建設的要求」，中國軍事未來研究會編，《亞太的漩渦——亞太地區軍事發展預測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93-299。
- 王琦(1989)，「核戰略」，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編，《軍事戰略簡論》，第十章，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54-169。
- 王樹春、牛力、王金瑞(1990)，「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威懾理論」，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編，《軍事戰略基本理論問題》，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27-137。
- 尹慶耀(1988)，《中共的統戰外交》，台北：幼獅。
- 林中斌(1999)，《核霸》，台北：學生。
- 林兆充(1989)，「威懾思想」，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編：《軍事戰略簡論》，第五章，北京：解放軍出版社，79-90。
- 朱明權(2003)，「什麼因素擋止了美國的中國的核攻擊？一關於美國對外政策制訂的一種個案考察」，肖佳靈，唐賢興編，《大國外交：理論、決策、挑戰》，北京：時事。
- 朱明權(2003)，「中國的核威懾政策：形成和發展」，肖佳靈，唐賢興編，《大國外交：理論、決策、挑戰》，北京：時事。
- 成國銀(1997)，「毛澤東的核戰略思想與實踐」，《四川黨史》，1997年10月，5-7。
- 胡彥林(1988)，「未來戰爭很可能是場有限核戰爭」，國防大學戰略教研室選編，《軍事思想論叢》，北京：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372-377。
- 宦鄉(1987)，「未來國際環境和我們的國防建設」，楊得志、宦鄉等著，《國防發展戰略思考》，北京：解放軍出版社，6-26。
- 馬祥林(1991)，「『早打、大打、打核戰』前後的風風雨雨」，《軍事史林》，北京，1991年11月，6，總37，3-10。
-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1927-199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姜直操編譯(1991)，「中國核力量概況」，《軍事史林》，北京，35，16-18，20。
- 桑中林、肖開仕(1988)，「我軍戰役理論的研究應增強『核觀念』」，國防大學科研部編印，《戰役基本理論新探》，中共軍內發行，出版社、地不詳，801-814。

時殷弘 (2002)，「美國國家導彈防禦計劃與中國的對策」，《中國外交》，北京，7，47-51。

張作文 (1998)，「周恩來與中國導彈核武器」，《瞭望》，4，26-28。

張健志 (1987)，「對中等有核國家核戰略之我見」，《解放軍報》，3月20日，版三。

張進喜、王顯存 (1988)，「毛澤東軍事思想與我國的核戰略理論」，《軍事知識》，北京，4-5。

張進喜 (1988)，「論我國戰役理論體系中的核戰役理論」，國防大學科研部編印，《戰役基本理論新探》，中共軍內發行，出版社、地不詳，839-845。

許忠敬、何立柱 (1990)，「核武器威脅與軍事戰略」，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編，《軍事戰略基本理論問題》，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78-287。

詹欣 (2001)，「評論美國對中國核武器研製的評估與對策 (1961-1964)」，《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8：3，86-94。

劉戢鋒 (1994)，「傳統文化中誕生的核戰略—評《龍威：中國的核力量與核戰略》」，《自然辯證法研究》，10：8，67-71。

劉鐵慶，容家信，常金安 (1988)：「戰略導彈部隊戰役理論體系雛議」，國防大學科

研部編印，《戰役基本理論新探》，中共軍內發行，出版社、地不詳，320-331。

閻少軍 (1990)，「我國進行核試驗、發射戰略導彈運載火箭地球衛星簡況」，《軍事

史林》，北京，2：26，50-51。

鄧小平文選 (1975-1982) (1983)，北京：人民出版社。

盧浩中、王顯存、郭順元 (1989)：「二十一世紀初亞太地區軍事形勢的預測及對我國

戰略核力量建設的影響」，中國軍事未來研究會，《亞太的漩渦：亞太地區軍事

發展預測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87-292。

瞭望 (海外版) (1987)：「中國研製原子弹、氫彈、核潛艇之謎」，香港，24，5。

戴超武 (2001)，「中國核武器的發展與中蘇關係的破裂 (1954-1962) (連載一)」，《當

代中國史研究》，北京，8：3，76-85。

戴超武 (2001)，「中國核武器的發展與中蘇關係的破裂 (1954-1962) (連載二)」，《當

代中國史研究》，北京，8：5，62-72。

韓先龍等編 (1990)，《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聶榮臻 (1984)，《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蘇起 (1992)，《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 (1979-1989)》，台北：三民。

Bough, William H. (1984),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Balance* (New York & London: Longman).

Brown, Harold and Joseph W. Prueher and Adam Segal (2003), *Chinese Military Power*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1998),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01), *Foreign missile developments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hrough 2015*, (http://www.cia.gov/nic/pubs/other_products/Unclassifiedballisticmissilefinal.pdf; accessed 20030812)
- Chang, Gordon H. (1988) "JFK, China, and the Bomb,"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4, 1287-1310.
- Chang, Gordon H. (1990)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yes, Antonia H. and Paul Doty (1989), *Defending Deterrence : Managing the ABM Treaty Regime into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ergamon-Brassey's).
- Clough, Ralph N. et al. eds. (1975),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Arms Control*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Cox, Christopher et al. (1999),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Commercial Concer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x Report)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 105-851 Declassified Report Release Date: May 1999 (Washington D. C.: U.S. Gouvenment Printing Office).
- de Gaulle, Charles (1970), "Allocution du 3 novembre 1959 à l'Ecole militaire" *Discours et messages Tome: 4, Pour l'effort, 1962-1965* (Paris: Plon, 1970).
- Dittmer, Lowell (1987),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Paragon House), 29-47.
- Garrett, Banning N. and Bonnie S. Glaser (1984), *War and Peace: The View from Moscow and Beijing* (Berkeley: Institutu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Garrett, Banning N. and Bonnie S. Glaser (1995/96),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3, 43-78.
- Gelber, Harry G. (1973), *Nuclear Weapons and Chinese Policy Adelphi Papers no. 99*.
- Gelber, Harry G. (1974),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SALT II" in *Contrasting Approaches to Strategic Arms Control* (London : Lexington), 221-247.
- Gordon, Peter J. (1989), "The Politics of Implementing China's Nuclear Doctrine, Part II , 1969-Present,"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8: 2, 18-37.
- Green, William C. and David S. Yost (1982), "Soviet Military Options Regarding China," in Douglas T. Stuart and William T. Tow, (ed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35-144.
- Heisenberg, Wolfgang (1989),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Nuclear Deterrence in East-West Relation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ecurity Studies).
- Jencks, Harlan W. (1982),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Jencks, Harlan W. (1988), "PRC Nuclear and Space Program," in *SCPS Yearbook on PLA Affair, 1987*. (Kaohsiung, Taiwa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05-124.
- Johnston, Alastair I. (1983), "Chinese Nuclear Force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 for Arms Control,"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2: 2, 13-28.
- Johnston, Alastair I. (1996), "Prospects for Chinese Nuclear Forces Modernization: Limited Deterrence Versus Multilateral Arms Control," *China Quarterly*, 146, 548-576.
- Kahn, Herman (1962), *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 (New York: Horizon Press).
- Kissinger, Henry A (1979),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Kristensen, Hans M. (2003), "Chinese nuclear forces, January 2003," *SIPRI Yearbook 2003: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http://projects.sipri.se/nuclear/china.pdf>; accessed 20030812).
- Lewis, John Wilson (1980), "China's Military Doctrines and Force Posture," in Thomaseds Fingar, ed., *Chin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 Policy Evolution in the 1970s*. (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 147-197.
- Lewis, John W. and Litai Xue (1987), "Strategic Weapons and Chinese Power: The Formative Years" *China Quarterly*, 112, 541-554.
- Lewis, John W. and Litai Xue (1988), *China Build the Bomb* (Standford,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John W. and Di Hua (1992), "China'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Technologies, Strategies, Goal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2, 5-40.
- Liu, Yueh-Yun (1972), *China as a Nuclear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 Manning, Robert A., Montaperto, Ronald Cochairs and Brad Roberts (2000), *China,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Nixon, Richard (1980), *The Real War* (New York: Warner Books).
- Norris, Robert S. and Hans M. Kristensen (2002), "Global nuclear stockpiles, 1945 – 2002,"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58: 6, 103-104.
- Pillsbury, Michael (2000),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Pollock, Jonathan D. (1972),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Nuclear Weapons, 1964-1969" *China Quarterly*, 50, 244-277.
- Pollock, Jonathan D. (1977), "China as a Nuclear Power," in William H. Overholt, (ed.), *Asia's Nuclear Futur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35-66
- Pollock, Jonathan D. (1984), "China and the Global Strategic Balance," in Harry

-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46-176.
- Romberg, Alan D. and Michael McDevitt, (eds.) (2003), *China and Missile Defense: Managing U.S.-PRC Strategi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 Roberts, Brad (2001), *China-U.S. Nuclear Relations: What Relationship Best Serves U.S. Interests?*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
- Robinson, Thomas W. (1987), "On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in Il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Paragon House), 2-18.
- Rumble, Greville (1985),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Defens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yan, Mark Anthony (1989),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Nuclear Weapon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East Gate Book).
- Shambaugh, David L. (1999/2000),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Ambival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3, 52-79
- Segal, Gerald (1980-1), "China's Strategic Posture and the Great-Power Triangle," *Pacific Affairs*, 53: 4, 682-697.
- Segal, Gerald (1982), "A Introduction to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in Gerald Segal, (ed.), *The China Factor: Peking and the Superpower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9-18.
- Segal, Gerald (1982),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in Gerald Segal, (ed.), *The China Factor: Peking and the Superpower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46-75.
- Segal, Gerald (1991), "China," in Regina C. Karp, (ed.), *Security With Nuclear Weapons? -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PRI), 189-205.
- Spanier, John (198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Stockton, Paul (1986), *Strategic Stability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Adelphi Paper no. 213 (London: IISS).
- Sutter, Robert G. (1994),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Policies: Implications and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for Congress*, 94-422 S.
- Swaine, Michael D. and Loren H. Runyon (2002), "Ballistic Missiles and Missile Defense in Asia" *NBR Analysis*, 13: 3.
- Thornton, Richard C. (1987), "Strategic Change and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erceptions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in Il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48-71.
- Treverton, Gregory (1980), "China's Nuclear Forces and the Stability of Soviet-American Deterrence," in Bertram Christoph, (ed.),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Deterrence* (London: IISS, The Macmillan Press), 38-44.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3),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PRC*, 2003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20030730chinaex.pdf>; accessed 20030801).
- Vigor, Peter (1989), "Western Perceptions of Soviet Strategic Thought and Doctrine," in Gregory Fiynn, (ed.),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and Western Polic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79-90.
- Whiting, Allen S. (1980), "China and the Superpowers:Toward the Year 2000," *Daedalus*, 109: 4, 97-144.
- Zhang, Xiaochuan (1989), "China's Nuclear Strategy," in Yufan Hao and Guocang Huan, (eds.),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79-100.